

# 魏晋玄学思想在陶渊明诗歌中的体现

李敏然

(华南师范大学 广东 广州 511400)

**【摘要】** 魏晋时期，纲常伦理分崩离析，儒家思想受到冲击，道家思想与道教的影响以及佛教之东传，因缘际遇下思想汇合，玄学思想形成；现实中，人民生活的水深火热，使得人们对自然和生命投射出独特关照，玄学也因此盛行。陶渊明作为东晋末年的著名诗人，其思想与作品深受魏晋玄学思想的影响，本文通过对陶渊明作品的深入解析，展现其作品中所体现的魏晋玄学思想，并指出其作品在玄言诗和田园诗中都拥有独特地位的原因。

**【关键词】** 陶渊明 魏晋玄学 三教合一

**【中图分类号】** I206.2

**【文献标识码】** A

**【文章编号】** 1673-9574(2022)14-0004-03

## 一、魏晋玄学思想的产生与发展

魏晋玄学思想的发端，不得不追溯到东汉末年的历史。东晋玄学发端的原因与因缘际遇共有其二：

### (一) 纷争带来的撕扯力量

东汉末年，大一统王朝渐渐走向衰亡。桓帝醉心于神仙，范曄引用《左传》中的“国将兴，听于人；将亡，听于神。”来评价桓帝，隐隐透露出汉朝日益衰亡的讯息。而朝代的分崩离析，在思想文化领域的“大一统”渐渐松懈，对文教的统治力渐渐减弱。此后的几百年间，军阀混战，不同文化、不同民族间相互碰撞、厮杀、融合。伴随着王纲瓦解所带来的巨大冲击，思想界也受到政治经济的影响，撕开了一片巨大的空间——“一种全新的、充满着解构的语言形式”在乱世中慢慢生长，受到重视。文人们开始脱离或半脱离儒学这座“黄金屋”，去寻找“黄金屋”以外的世界。

其次，各派纷争除了对王纲带来的撕扯力量，给思想界撕开了一片巨大的空间以外，其本身也是对“人”一种撕扯。东汉至东晋的二百余年间，如：巨鹿之战、赤壁之战等的战场约有95处；而小的数目更是无法估量。在这个动荡的时代，由上层阶级到下层阶级，非正常死亡的人数之多，数目之巨大，令人触目惊心。王粲曾在《七哀诗》中写道：“出门无所见，白骨蔽平原。”虽不乏有夸张的成分，但由此我们也能了解到，在那个时代里，战争对每一个“人”肉体上的撕裂，生存、活命、逃避战火、更要逃避人吃人的现状，已成为每一个下层人民的生活全部，文人见此纲常崩坏、民不聊生现状，再也无法相信传统儒学中所强调的三纲五常和守序祥和，这些精神价值观念无法支撑王朝的运行，更无法支撑民众的生活，明显地，儒学中所强调的伦理秩序与生死观已然不适应当前社会，人们开始寻求能支撑他们活下去的精神动力，他们需要的是首先与

生命相关的精神力量，此时，关注自然、天人与气运便逐渐登上历史舞台，成为取代两汉儒学的主要是像潮流。

### (二) 诸子之学资源重组与释教东来

东汉时，受政治生态和在位者的影响，对儒学的研究不再像武帝时的兴盛，研究也渐渐陷入了僵化、教条化的局面，日益繁琐的研究内容与日益狭小的研究空间让许多文人在这“黄金屋”里喘不过气。而正如上文提及，恰逢政局动荡，战争连年，儒学渐渐让出舞台，给诸子之学让出恢复、再发展的空间。而对玄学产生最大影响的，是道家思想的复兴与道教的兴起，这一时期，道家思想得到了统治者的偏好和推动，再加之儒学让步，得到了空前的回复与发展。东汉时桓帝信奉神仙，从他亲自祭拜老子的事件中，我们可以推测，东汉晚期在统治者的引导下，道家思想逐渐有抬头的趋势。到了魏晋时期，大批名士开始倡导“将无同”的理论，希望调和儒教和道教的冲突。此时道家复兴，主要不在于学术思想上，而在于其作为“道教”的基础，在此基础上，一批以道教为基础的各类教派纷纷出现，诸如太平道、天师道等，一边拥有着宗教的底色，另一边通过教派活动的开展、吸纳民众、传播教派思想，从而在无形中推动道家文化的复兴，成为玄学思想发端的沃土。

同一时期，佛教亦正传入中国，寻找合适的扎根方法。佛教为了能顺利进入中原，最先依附于神仙方术、阴阳之流，渐渐地向黄老之学靠近。桓帝将佛教与黄老之学一同当作神仙加以淫祀，佛教不知不觉间以官方的途径传入中国后，在部分统治者的宣扬之下，寻找到合适的形式，在中原扎根发展，实现本土化。学者韩杨文认为：“佛教融入中原士人思想的过程，大致与魏晋玄学的进程是同时的，二者是缠绕在一起的。”而任继愈也认为，般若学说广泛流行是在魏晋玄学兴起之后，正式依附于玄学才得到巨大发展。佛教与玄学的密切关系，不仅

是佛学依附玄学得到发展，佛教思想也逐渐渗透到玄学中，为其所用，二者是相互促进、相互推动的关系。因此，玄学中对于“色”与“空”等哲思的探讨，“任侠放荡”的特点，神仙方术的杂糅都体现着佛教对玄学发展的影响。

综上，魏晋玄学便是在一个特殊的契机和时代中应运而生——思想上，儒教为其留出思想空间，道家思想与道教的影响以及佛教之东传，因缘际遇下思想汇合；现实中，国家王朝的分崩离析，人民生活的水深火热，都使得当时的人对生命和自然投射出特别的关照，因而魏晋玄学不仅得以形成，更有其群众基础得以发展。

而陶渊明便是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中。生于东晋末年的陶渊明，其所在时代便是魏晋玄学极为流行的时代，清淡之风大盛。魏晋玄学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的思想，影响着他人的人生际遇。陶渊明与玄学的联系，最早可追溯到他本人与外祖父的交往中，据《晋书》记载，其曾祖父是晋大司马陶侃，其外祖父为东晋名士孟嘉。陶渊明专门为其作《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传》，可以推测，他与外祖父关系十分密切。虽然陶渊明接受过儒学正统教育，但外祖父对他的影响同样不能忽视。当时的征西将军庾亮曾评价孟嘉“盛德人也”，而名士许询也与孟嘉是投契的知音，庾亮和许询都是东晋时玄言诗的代表人物，可以推测，陶渊明的外祖父孟嘉想必与玄学、玄言诗有所接触，极大可能也是“魏晋风度的践行者”。而在陶渊明为其所作之传中还提到外祖父“任怀得意、融然远寄”等心性品德，这些品性与魏晋玄学家们总体上是相通的。观乎陶渊明的心性品德，不仅有外祖父的影子，更有玄学思想的影子，陶渊明作品中有意或无意流露出的玄思，与此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。

## 二、陶渊明诗歌中玄学思想的体现

### （一）“仕”与“隐”的羁绊

探讨陶渊明的一生，不能离开的是“仕”与“隐”的羁绊，为官十三载，调任多次，各路辗转，最终他还是选择“不为五斗米折腰”，隐退于田园之间。而关于“仕”与“隐”所带来的种种羁绊，以及关于“羁绊”的思考成为了陶渊明诗歌的重要部分，而这背后所透露出来的玄思亦让人回味无穷。

《归园田居》中有：“误落尘网中，一去三十年。”在《饮酒其八》中也写到：“吾生幻梦间，何时继尘羁。”此处的“尘羁”与“尘网”所指之意皆为仕途带来的羁绊，尘世就像一张罗网，紧紧地将他困住，仕途中遇到的人情冷暖、明暗手段，

无一不让陶渊明感到疲惫。因此才有了“何时继尘羁”这一句，不被尘世所羁绊，是陶渊明的心之所向，生命有限，弥可珍惜，不必把自己束缚在尘网中，失掉自己独立自由之人格。但若生计无法满足生理需求，他又如何能毫无顾虑地奔向他所想“独立自由之人格”呢？家室老小，无一不等着他来养活，他不得不入世。因此，陶渊明对于“仕”与“隐”的羁绊，不仅只停留在他个人的层面，还有对他人、对责任的思考，他受外物所累，所牵制，似乎要失去其自主性，但同时他却又异常地敏锐机警，察觉到自己身上的“羁绊”，不但没有陷入凡尘名利欲望中，反而能警醒自己，能抱着出世超然的祈愿在世俗中求得生存。

陶渊明诗中对于“羁绊”的探讨，与魏晋玄学中“圣人与常人之别”“圣人无情无情之辨”有着相似之处，二者同是对于“外物所累”的探讨，对于“羁绊”的探讨，陶渊明思想上接受了玄学的出世精神，但也被自身经历影响，时刻在入世，来去之间，如何寻求内心平衡，是陶渊明本人需要解决的问题，也是他的文章与思想的独特之处。王弼曾说：“圣人能‘物物而不物于物’。”陶渊明虽曾被外物所累，受着牵绊，是个凡人；但他却又能保持初心，不失其自主性，未尝不是一个“有血有肉有感情的圣人”。

### （二）“荣”与“枯”间的自然之思

陶渊明作为田园诗派的开荒者，“自然”与“荣枯”是其热爱并常探讨的话题。陶诗中对于“自然”的探讨，许多学者都对其颇为留意。但翻阅《陶渊明诗笺证稿》后，我却想将“自然”这一话题与“草木荣枯”联系在一起探讨。

《归园田居》中陶渊明写道：“久在樊笼里，复得返自然。”在《归去来兮辞》序中有：“质性自然，非矫厉所得。”王叔岷认为：“自然有二义，一为心境之自然；一为外境之自然。陶渊明所重者，尤为心境之自然。”陶渊明诗中对于外境之自然的描写是细腻的，更是千姿百态的，他书写外境的一草一木、书写青松与傲菊、书写霜露与日头、书写对于上古社会朴素自然的向往；他更深深扎根在外境之自然中——亲自“晨兴理荒秽，带月荷锄归。”而这一切外化的自然意象，都指向他所追求的“心境之自然”。由外到内，躬身经历，在自然中寻找自然，不自知地追求玄学倡导的清静自然的生活，追求超然脱俗的隐逸。在外物之自然的描写背后，是陶渊明对于老庄思想的诠释。

而陶渊明对于自然的哲思，不仅仅体现在“自然”二字

上，还体现在“草木荣枯”上。在陶诗中，除了常见的“菊”“松”等意象外，“草”与“霜露”这两个意象亦经常出现，而且常与“荣枯”“衰荣”等挂上联系。如《归园田居》中的“常恐霜霰至，零落同草芥。”又如《形影神（三首）》中的“草木得常理，霜露荣悴之。”等都谈到了同一话题。草木荣枯，霜露覆盖，万事万物的转化也不过于此。对于《形影神》中的一句，车补作注释曰：“‘荣悴’作‘憔悴’，上既云‘霜露’泽当益荣悴为是。礼记乐记郑注：‘理，犹性也。’谓耐久不变之性也。此二句言草木虽因霜露而荣悴，然而本根之生机则不变也。”陶渊明之卓识，与俗言草木朽者迥异。草木被霜露覆盖，看似衰败，但其本质仍然是充满生机的；这句诗看似在写草木的衰败，深究才发现，在写它的不朽生机。但在《归园田居》中，陶渊明却用了“常恐”二字，来自喻自己恐与草芥同朽之意。

两个作品，同样的意象，一个强调的是“不朽”，一个强调的是“朽”。二者在同一个物体身上相互转化，可看出陶渊明显辨性的思想——他希望能像《形影神》中的草木一样即使受到外界的打击仍然能坚守初心，不被同化，超然脱俗地活着；但他也担心自己身在尘俗这个“樊笼”中太久，以至于被同化，成为《归园田居》中谈及的“朽”。这样的思辨精神以及对人身要义的领悟，是陶渊明追求“心境之自然”的具体方面，他了解自己，更活得通透；他有“不朽”之理想，也察觉“腐朽”的侵蚀。陶渊明文字中流露出的思辨性与通透性，与魏晋玄学的思考方式有相似之处，虽然研究思辨的问题不同，但其思考方式、观察方式确实相似的。

### （三）“言”与“意”之间的思辨

要说陶诗中最负盛名的诗句，莫过于“此中有真意，欲辨已忘言。”此处，陶渊明没有直接阐明自己的观点，究竟是“言不尽意”还是“言能尽意”，只用一“忘”字，表达出他当时的心态。心中是有意的，但真正想要深究时，却早已忘了各种意义究竟该如何表达。而他所想表达之意，便在这“忘言”之中，引起后来者的无限思考，他仅用一个“忘”字不仅诠释了自己对于“言”与“意”之间的思辨，还留给我们后来者广阔思考空间，引得无数后来者争相猜测、争相考据、争相论断，用所有后来者之思开拓对于“言”与“意”之探讨的无限空间，实在令人叹服。而关于“言”与“意”的争论，是魏晋玄学中的一大思辨问题，我们可认为，陶渊明诗文中的玄学思想可从此诗中得到体现。但笔者认为，这句话能体现浓厚的玄

思，不仅在于其内容；更在于其的写作手法，无论是作家还是诗人，不仅关心他写什么，更要关心他“怎么写”，这里陶渊明用一个“忘”字给我们留下无限的疑问，无限的线索，可谓真正诠释了玄学思想中的那句“玄之又玄，妙之又妙。”

### 三、结语

海德格尔曾说：“作品让大地是大地。”陶渊明的诗便是落在大地上的作品，他写田园风光，他写山水自然，他更喜欢随着这些“外境”去阐发内在的“心境”与玄思。有学者曾与将他的诗歌与魏晋玄言诗相比较，认为陶渊明的诗更能让读者感知到玄学的奥妙。笔者认为，这其中与“落在大地上”有着莫大的关系魏晋玄学盛行，当时文人之多，但能出作品受后人记住并拜读的，却是冰山一角，大多的魏晋玄言诗都因为语词生涩，脱离实际而遭到时代的淘汰，而陶渊明的作品不仅让人读着玄妙，还能流传千古，很大一部分原因是陶渊明躬亲生活着，不论是出世还是入世，所写的也是亲身的感受阐发，而不是简单的架空说理，因此，其作品中多了一些烟火气与人情味，但又不乏玄思与哲理，这便是他出彩的地方。从田园诗的角度看其作品，魏晋玄学思想，也让他的田园诗不仅仅是浮于自然写作、浮于表面，而是由表及里，由景到心，由自然到哲思，魏晋玄学为其注入的闪光之处，让他的田园诗自成一派。

### 参考文献

- [1]李娜.论陶渊明诗歌与东晋玄言诗之关系[J].安康学院学报,2019,31(04):22-26+36.
- [2]韩扬文.玄思的开显与魏晋玄言诗[D].云南大学,2016.
- [3]王立阳.浅析陶渊明诗歌的玄言成分[J].中共济南市委党校学报,2018(05):87-89.
- [4]贺昌群,季镇淮.魏晋清谈思想初论[J].清华大学学报(自然科学版),1947(00):173-180.
- [5]王叔岷.陶渊明诗笺證稿[M].北京:中华书局,2007.
- [6]谢泳.试说陈寅恪《论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》本事[J].书屋,2016(12):47-49.